

Teahouse For Economists

# 经济学家茶座

总第十四辑



- ◆ 黄有光
- ◆ 赵 泉
- ◆ 陈彩虹
- ◆ 詹小洪
- ◆ 许 斌
- ◆ 李文博
- ◆ 卢周来
- ◆ 王建国
- ◆ 梁小民
- ◆ 薛小和

一元就是一元 为何在个别措施上应该以效率挂帅？  
人口：从真理到谎言  
汉城物价：「必寡盼」  
旅韩日记（一）  
比较优势和战略优势  
被「殖民化」的「经济学帝国主义」  
中国的非主流经济学 一个初步的综述  
观念是利益的本质  
北大经济系师长杂忆（二）  
父亲是学者 公公是理财家

2003 · 4

山东人民出版社

## “茶客”风采



辛向阳，1965年生。风筝之都潍坊人。1981年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学习，1991年毕业于该校，获法学博士学位。1991～1995年4月在中国人民大学比较文明研究所任教。1995年4月至9月在北京市委研究室任调研员。1995年10月起就职于首都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1998年10月起任该所副所长。兼任山东中创软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及副董事长，北京市决策研究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政府理论与政府改革、中央与地方关系、共和政治制度、企业决策。

其实，严格地讲，我是从事政治学研究的，“个人偏好”是政府改革、民主政治、共和制度和决策建设。我一直有兴趣参加一个《政治学家茶座》。但目前尚未创办这样的《茶座》，于是乎便拐进了这飘着浓浓香味的《经济学家茶座》，旨在领略领略各位“高人”的风采，听听各位“神仙”的高见。谁知道，在不知不觉中竟然吃上了《茶座》的香茶。在吃这香茶的过程中，我发现政治学的很多研究必须借助于经济学的方法（当然，我不认为这就是所谓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政府的成本分析、共和制度的经济基础、政府决策咨询产业化等等。从发展的角度看，经济学进入政治学领域越深、越广，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会越有成效。

——辛向阳



## 小镇的茶馆

●金明善

小时候生活在一个不大不小的镇上，镇所是公社驻地，约有千把户人家。镇上有一条东西大街，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每逢阴历一、六大集，又是较繁荣的农贸市场。伯父家有里外两进的房子，其临街的三间开了一个茶馆，门头上挑着一把烧黑的漏铁壶算是幌子。时间也就在“文革”前吧。

说是茶馆，实际上主要是卖烧白开。房子的西间，垒着一个长炉灶，灶头放一个大风箱，拉起来可以一排同时烧五六个方铁壶，每个铁壶能盛两暖瓶水。另外两间，有两张破旧的八仙桌和几条长凳，也就算是茶座了。

镇上的人有喝花茶的习惯，但一般人家并无专门用来烧开水的炉子，做饭用的镉锅水是不能用来泡茶的。因此，伯父家的茶水买卖很是兴隆。记得为方便交易，我还专门帮他制作发行了水票，也就是找来一些白板纸，剪成寸把长的长方条，再盖上伯父的手印章也就行了。现在看应算是有价证券。镇上的人，特别是像派出所、供销社和公社机关的那些吃公家饭的人，一次买上5块钱的水票（批发优惠，可买200张），两三个月的开水供应也就有保障了。好在当时做这样的生意并不征税，吃公家饭的人喝开水也都肯自己掏腰包，并没有人讨要发票回单位报销。否则，伯父的买卖肯定做不成，更不用说发行有价证券了。

茶馆的茶座生意似乎不太能赚钱，整天坐在茶馆里的多是街面上一些游手好闲的人。但他们关心镇上的大小事，信息比较灵通，大到年景收成预测，小到柴米油盐物价指数景气分析，张家长，李家短，道听途说，时时发布。直到伯父的紫红泥茶壶的茶根冲泡得一点颜色都没有了，他们还不肯离开。倒是经常有乡下到镇上办事、赶集的人肯舍得花上两毛钱要一壶新茉莉花茶喝。偶尔也能看到一些出苦力的人来到茶馆，但多数进门就抄起水舀子，冲着水缸喝生水。

如今，这样的茶馆城里头没有，小镇上大概也见不到了。无论如何我们的《经济学家茶座》应该有一席之地，尽可能地关注那些带有乡土气息的茶客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需求，不要使其在情感上远离我们！



## 经济学家茶座

(第 14 辑)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远 王东京  
王振中 王瑞璞  
冯兰瑞 刘 伟  
刘方棫 刘国光  
吴树青 汪丁丁  
张卫国 杨瑞龙  
林 岗 项启源  
钟朋荣 洪远朋  
洪银兴 胡培兆  
赵 晓 顾海良  
梁小民 程恩富  
蔡继明

主 编

金 明 善

副主编

刘 德 久

执行主编

詹 小 洪

责任编辑

董 新 兴

陈 丹 丹

金明善 小镇的茶馆/1

## 【国是我见】

黄有光 一元就是一元:为何在个别措施上应该以效率挂帅?/4

赵 泉 人口:从真理到谎言?/8  
辛向阳 “暴利”的产业与决策的科学化/13孔凡来 国际化都市的“第九军规”/18  
张曙光 高标准和低水平/23

## 【异域游学】

陈彩虹 汉城物价,“必赛哟”!/26  
詹小洪 旅韩日记(一)/30  
朱 玲 老年留学记/44  
董志凯 我在南非宣讲中国经济改革/52

## 【学问聊斋】

卢周来 中国的非主流经济学:一个初步的综述/56  
许 斌 比较优势和战略优势/63  
李文海 被“殖民化”的“经济学帝国主义”/66聂辉华 如何创作经济学论文/70  
谢作诗 经济学不排斥道德,但经济学家不“讲”道德/78

## 【时空之星】

于光远 我以有钱三强这样的同学为光荣/80

## 【学界万象】

胡培兆 合署论文何其多/85  
管晓云 在诺贝尔奖与克拉克奖之间/88  
刘建兴



# 【生活中的经济学】

- 董国政 “市场是为人类服务的  
第一台电脑”/97  
吴克明 雪中送炭还是锦上  
添花/102  
曹安南 房价为何居高不下? /106

# 【评论与随笔】

- 王建国 观念是利益的本质/110  
蒲勇健 存在的互补:对利他行为  
的一种经济学解释/112

# 【经济学人】

- 梁小民 北大经济系师长杂忆  
(二)/116  
薛小和 父亲是学者,公公是理  
财家/125  
岑 科 茅于軾与青年经济  
学人/137

# 【学者访谈】

- 柳 红 远山在呼唤——王则柯  
访谈 /144

# 【并非抬杠】

- 杨天宇 阿 Q 精神的底线 /151

# 【茶座填字】

- 梁小民 茶座填字/153

# 【旧事重提】

- 杜恂诚 民国初年畸形发展的  
地方银行/155

# 【编读往来】

- 赵 娜 鸿儒和白丁/159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学家茶座.第14辑

金明善主编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10

ISBN 7-209-03333-5

I.经… II.金… III.经济学  
—文集 IV.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第 097795 号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http://www.sd-book.com.cn>

编辑部电话(0531)2060055-4901

E-mail:chazuo4901@sohu.com

发行部电话

(0531)2060055-4966 4903 4912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880×1230 毫米 1/32 开

5 印张 130 千字

邮发代号 24-180

定价:10.00 元



## 一元就是一元：为何在个别措施上应该以效率挂帅？

如何平衡效率与平等是公共政策的一个重大问题；笔者对这问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答案：在个别问题上，以效率挂帅，平等的目标由整体的平等政策来达致。

●黄有光\*

张宏志先生在《茶座》第12辑谈了公平与效率的取舍问题，感叹许多可以在效率上大大改进的地方，都被局部的公平考虑所否决。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

公平牵涉到的问题比较广与复杂，而对于经济问题，经济上的平等是公平的一项主要内容。因此，本文主要谈平等与效率的取舍问题。

如何平衡效率与平等是公共政策的一个重大问题，笔者对这问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答案：在个别问题上，以效率挂帅，平等的目标由整体的平等政策来达致。所谓以效率挂帅，并不是不考虑公平，而是对平等的考虑，必须以不违反效率为原则。如果一项措

施能提高效益，但会对某些人造成损失，以效率挂帅的原则并不排除对这些人的补偿，而是不允许为了公平或其他原因而不进行能提高效益的措施。即使由于补偿的困难而使这项措施非对某些人造成损失不可，也不可以用平等上的顾虑来反对这措施。

在个别问题上以效率挂帅的政策，可能增加人们的实际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效率提高而不平等增加，社会福祉未必增加。这问题可以通过增加整体的平等政策的幅度（增加对富人的税与对穷人的补贴）来解决。不过，这会打击激励，而造成效率上的损失。为了减少这损失，多数经济学家反对增加整体的平等政策的幅度，而容忍、支持、甚或鼓吹在

\* 作者系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教授。





个别问题上的平等措施,例如在成本效益分析上用收入加权,把富人的一元算成五毛,把穷人的一元算成二元。这虽然有效率上的损失,却因其在平等上的贡献而被接受。多数经济学者认为,单靠整体的平等政策,由于幅度大,通过打击激励造成效率上的损失很大,因为这损失与扭曲(如税率与补贴率)的平方成正比。因此,对平等的追求,应该分散到许多个别问题上。 $10$  个  $2$  的平方等于  $40$ , 而一个  $20$  的平方等于  $400$ 。

上述似乎很有说服力的论点,忽视了下述重要差异。如果没有效率上的原因,而纯粹由于财政收入上的原因,对个别物品征税,效率损失与税率的平方成正比。人们购买某物品的多少,根据这物品的价格与其边际效益。如果不考虑行政成本,征收同样的税额,分散向多种物品征收,效率损失比较低。“ $10$  个  $2$  的平方等于  $40$ ”的算法大致合适。(为简单起见,不考虑物品之间的相互关系与有关次优问题。)但是这算法不合用于平等政策对激励的打击,因为人们决定是否多工作、多挣钱,是根据多挣的钱的总购买力。因此,平等政策对

激励的打击,是根据所有平等政策的总和而定。把平等政策分散到多方面,只要对平等的达致是一样的,对激励的打击也一样,并不能减低。相反,在个别措施上的平等政策,除了对激励的打击,还会在不同物品之间造成扭曲,因此在效率上造成更大的损失。因此,对平等的追求,应该由整体的平等政策来达致。在个别措施上,应该以效率挂帅。这就是笔者“一元就是一元”的主要论点。(详见笔者《效率、公平与公共政策》,经济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六章)

在个别具体政策或措施上,不论富人或穷人,一元就当一元看待,以效率挂帅。这看来是极端右翼的观点,怎么会由一个“左”倾学者提出呢?难道此人已经做了  $180$  度的转变?比起笔者中学时期在马来西亚积极从事秘密反政府的共产主义活动(笔者现在还以此为荣,虽然当时的许多观点与做法是错误与幼稚的,但是动机是非常高尚的),笔者的思想的确有了很大的改变,但至少在经济学界中,只能算是中间偏“左”,完全不能算是右翼分子。“一元就是一元”的观点,实际上并不是右翼观点,因为它并不排





除在整体的平等政策上,采用大幅度的重分配。不论我们要有多么大的重分配,有效率的方法是在整体的平等政策上实行,而不是在个别具体措施上。

还有一件真实故事,可以证明笔者并不是由于右翼思想而提出“一元就是一元”的观点。多年前,莫纳什大学 PARISH 教授和我吃午餐,说他不赞成一些经济学者的做法,在成本效益分析上,把穷人的一元当二元算,把富人的一元当五毛算。他认为一元就是一元。我说,用这种收入权数是否过分,可以商榷,但原则上,由于边际效用递减,一元钱对穷人的效用大于对富人的效用,在成本效益分析用收入权数是合理的。我们的争论没有结论。过后,我就写文章,要证明一元不等于一元。但证来证去,结果是:一元就是一元!可见我的心是“左”倾的,只是我的头脑右倾。

效率挂帅,一元就是一元的论点,虽然实质上并非右倾,但至少表面上,这论点看来极端右倾,即使对右倾经济学家而言,也是过度右倾。因此,我那篇证明一元就是一元的文章,从 1975 年开始,先后被五家期刊退稿,经过多次修改,到 1984 年才在《美国

经济评论》上发表,创下我本人的记录。

不过,一元就是一元的论点,在实际经济中的应用,尤其是在整体的平等政策不完善的国家,有很大的局限。如果在个别措施上采用一元就是一元的原则,使许多有效率的措施得到执行,可能使穷人损失,虽然富人的得利,在金钱上算更大,但在效用或福祉上可能较小,得不偿失,必须在整体的平等政策上采用有利穷人的配套措施,才能保证社会福祉增加。不过,这个局限本身也有局限。那些造成整体的平等政策不完善的因素,大都在个别措施上也起作用。因此,如果因为整体的平等政策不完善,而想通过在个别措施上的平等考虑来促进平等,除了会大量牺牲效率外,也未必真能达到平等的目的。例如,如果某些掌握权力的人,能够避免受整体的平等政策的影响,他们也能利用权力来避免受个别措施上的平等考虑的影响。

像中国的情形,应该加强整体的平等政策,尤其是在除贫、照顾失业人士、落后地区的教育、避免通过滥用权力致富等方面。整体的平等政策加强后,就能使人们较容易接受在个别措施上采用





一元就是一元的原则,就能较大地避免张宏志先生所说的许多为了局部与短期的公平,而大量牺牲效率的可悲结局。

一元就是一元的原则的证明,应用了理性人的假定。但实际上人有相当大的不完全理性的因素。[详见笔者在《社会选择与福利》(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 2003 年 4 月的一文]这对一元就是一元的原则有什么影响呢?严格而言,须在不完全理性的条件下分析平等与效

率的取舍。不过,直观上可以看出,不完全理性的因素主要影响对效益的评估,在这新的评估下,不影响一元就是一元的原则。例如多数人高估金钱对福祉的贡献,加上相对竞争与生产和消费对环境的破坏,使人们用太多时间与精力拼命赚钱,而牺牲健康、友情、亲情等对福祉更重要的东西。因此,对环保、健保等的效益评估,须相应提高,而不单是根据人们的支付意愿。

## 书讯

### 《自由主义社会理论——解读 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出版

该书是《名家解读经典名著丛书》之一。哈耶克是 20 世纪西方最重要的自由主义理论家之一,《自由秩序原理》乃其撰写的最为重要的自由主义理论巨著。邓正来先生是国内最早介绍哈耶克著作的权威,由他翻译的《自由秩序原理》在国内向来赞誉颇丰。本书正是邓先生在对哈耶克译介和研究的过程或基础上写就的,相信会为我们沟通大师、匡正思想解除不少疑惑。

(邓正来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8 月出版 定价:18.00 元)



## 人口：

## 从真理到谎言？

◎赵 泉\*

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一出版就给经济学贴上了“沉闷科学”的标签，然而，即使马尔萨斯自己也很快发现，人们的生育行为未必如第一版中所预测的那样悲观，在以后的版本中，他对自己的理论有所修正，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第一版的观点。今天的经济学家在回答马尔萨斯“低水平均衡陷阱”的疑惑时几乎不费什么力气：家庭对孩子的需求是个经济行为，服从资源禀赋和孩子价格双重约束，当父母收入增加了，可以养育更多的孩子，那么，孩子的数量可能会增加；但是，父母的收入增加了，孩子（一个需要耗费父母大量时间的“产品”）的影子价格也因而上升，这个因素会促使父母减少孩子的数量，将节省下来的财富用于消费更多其他产品与服务。孩子的数

量取决于这两个因素谁占主导地位。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经验事实为，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替代效应会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加里·贝克尔从父母为孩子提供人力资本投资这个角度发现，孩子的质量提高可以为父母带来更大的效用，而孩子的质量提高则进一步提高了孩子的价格，那么，替代效应占据主导地位的可能性也就进一步上升，由于孩子的机会成本提高和质量替代数量的发生，其结果就是孩子数量的减少。

马尔萨斯只注意到收入效应而没有注意到替代效应，才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正因为充分认识到了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此消彼长的关系，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对生育问题从来没有悲观过，那些“仅有立锥之地”的预言在他们看来不过是

\* 作者系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一个荒唐的故事。(西奥多·舒尔茨)其他经济学家则更为干脆：“人类的未来是没有尽头的!”(彼特·鲍尔)

然而，在缺少市场的条件下，家庭生育选择无疑会因缺少价格信号而扭曲：如果原来由家庭承担的孩子抚养费用现在有人（政府）代为买单，何不趁机多生几个？马寅初注意到了这个现实：在计划经济和赶超战略双重约束下，人口增长（数量大）与资源约束（资本缺）以及重工业优先增长（既定目标）之间有着难以调节的矛盾，提出了控制人口和尽可能发展一些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小心翼翼地提出后者——的主张。然而，他的学说有点生不逢时，1957年正是工业化的快速起步阶段，政治领导人非常兴奋地注意到，大工业的兴起每年吸纳超过1000万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业部门，这时劝说领导人控制人口，显然有点不合时宜。马寅初被公众理解为人口学家虽然没错，但对那些没有真正看过《人口论》的人来说，说他是个经济学家才是准确的：马寅初在讨论人口问题时算的可全是经济账，一直在围绕着劳动力过多与

资本密集型产业之间的矛盾讲道理，即使为国家控制人口寻找道德上的合理性，他也说政府为孩子的抚养承担了大部分成本，因此，生育孩子可不光是家庭内的事，政府说了也得算。

政治领导人很快就认识到了这种矛盾的严峻性，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就开始不断宣传控制人口。在公众的眼中，马寅初的悲剧在于他不但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和围攻，而且即使在控制人口的思想已经深入到政治领导人的头脑中以后，仍未得到政治上的平反和恢复名誉。正是这种悲剧色彩激起的同情使以后任何敢向控制人口这个观念提出质疑的人，会因对马寅初先生的尊敬而在道德情感上先处于劣势。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家庭是生育孩子的决策主体，孩子的抚养成本越来越多地由家庭承担，这时，继续控制人口的依据何在？这仅仅是个次要的问题。当市场发育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兴起导致那些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反而成为劳动力最为短缺的地区，并吸引了中西部劳动力蜂拥而入时，我们该反思一下：人口控制政策是否走到了尽头？





笔者曾经向一个人口学家请教过这个问题：今天，中国还有必要继续控制人口吗？立即遭到他严厉的批评：有人做过预测，如果按照英法等国人口转型的过程看，总和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至少要 100~200 年的时间，那时，中国的人口会达到  $\times \times \times$  亿以上，后果不堪设想。

虽然出于礼貌没有进一步反驳，但是，这个能够预测 200 年以后中国人口数量的模型一定是算命先生喝了 2 斤白酒之后拍脑袋拍出来的。这个模型考虑劳动者收入增长了吗？考虑孩子的机会成本变化了吗？考虑孩子的质量提高了吗？考虑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提高了吗？考虑城市化进程了吗？……如果根据人的自然繁殖力推断生育多少个子嗣，把农民当成有饭吃就要生孩子的低等动物，刚好掉进了马尔萨斯陷阱，这才是不正确的。

然而，抛开这些情感因素缠绕，我们还是无法回避这个问题：中国的人口控制政策已经实行 30 多年了，这个“基本国策”什么时候才是完成历史使命之期？中国政府在提出控制人口政策时从来就没有说这个政策要一直实行

下去。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的总和生育率已经到了 1.22，远远低于 2.1 这个更替水平。再看人口年龄结构金字塔，0~4 岁人口的数量已经少于 50~54 岁年龄组的人。由于人口结构已经成为典型的菱形，假定 64 岁以上的人口全部退出劳动力市场，那么，2015 年后，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增加开始少于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数量。这个简单结果与我见到的任何人口（统计）学家的预测都不一致！2001 和 2002 年，中国的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仍然在继续 1987 年以来的稳步下降趋势，没有理由相信中国的生育水平明天会突然反弹。

如果单单是出生人口减少了似乎并不是一个问题，如果把这个问题与老龄化结合起来问题就严重了：在现收现付体制下，谁来养活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呢？

生育是个家庭决策行为，但在劳动经济学中却是劳动力长期供给范畴内的一个构成部分。然而，中国的经济学家很少讨论这个问题，前段时间，看到蔡昉教授在谈劳动力流动的一本著作中分析了中国人口控制问题。蔡





昉教授从现代经济学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着手,分析了随着家庭收入水平提高,家庭养育孩子的成本也会相应提高,家庭对孩子需求的替代效应逐渐超过收入效应,从而愿意选择更少的孩子;同时,他还分析了孩子的质量对家庭决策的影响:孩子的质量提高后,父母面对的影子价格更高了,那么,对孩子的需求减少就会更快。他还指出了家庭主动选择控制生育的途径:改革农地制度;提高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行业转移。

然而,他的话锋一转,认为当前人口控制政策不可动摇,原因在于农村仍然面临着很大的生育压力。具体说来就是农村还有30%的剩余劳动力,农民(包括父母和子女)的素质不高(父母和子女的受教育状况都影响生育数量),以及农村还没有为社会保障体系所覆盖等。蔡昉先生对家庭生育选择的分析逻辑是严密的,但认为人口控制政策目前还不可动摇则没有给出可信的证据,尤其是把一些学者计算出的“难度系数”当作生育面临压力的证据显得有点勉强:一个结婚时计划要生3个孩子的夫妻,在看

到邻居家孩子上了大学时,他们很快就会调整自己的数量计划:“我们可不想让孩子落在人家后面!”这时的资源足以供3个孩子上大学吗?怎么办?少生一个甚至两个吧!

同样沿着贝克尔等经济学家的思路,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农村是否真的面临很大的生育压力: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受教育水平提高最快的是农村人口,无论是父母还是孩子。1982年,农村30~35岁的妇女平均拥有成活子女2.79个,1990年这个数字下降到2.22个,2000年,进一步下降到1.74个。下降速度超过城市。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生育数量下降是人口控制政策的结果,还有可信性:从《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上公布的这个时期的绝育手术和人流手术数量能够看出执行政策的严厉。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生育率的持续下降,是政策控制更严了吗?不,这个时期因为法制开始健全,80年代“扒房抓人牵牲口”做法越来越少了。绝育手术和人流手术的数量减少了,1996~2000年5年的绝育手术数量和人流手术数量之和不及1983年一年多。人口控制力度





减轻了,但妇女生育孩子的数量却在持续减少,尤其应注意的是,今天,在不少省份开始放松生育控制(降低生二胎的门槛)的条件下,生育率反弹的迹象似乎也没有出现。笔者推测,这很可能是替代效应超过收入效应的结果,如果真的那样,中国可以在废止人口控制政策的同时仍然保持现在的低生育水平。(低生育水平真的是一个值得追求的政策目标吗?笔者一直怀疑这一点。现在已经不再是计划经济时代了。)

为什么会发生替代效应超过收入效应?改革开放25年来,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受教育水平提高之迅速,中华民族历史上哪一个“盛世”能够比拟?这就是替代效应渐长的基础。

事关“基本国策”,本文仅仅是指出(或者是重复)了这个重要问题,并没有给出任何严格的论证。这个问题如此重大,而本人又自认力有不逮,才希望借助《茶座》这个台面,呼吁同好中那些训练有素的先进——尤其是蔡昉教授——关注这个问题。

咱说的都是“普通话”嘛!

另外,应指出的是,我没有任何对蔡昉先生的不敬,相反,我认为他是《茶座》上举止最优雅的客人之一,他的“烹茶技艺”常常让我联想起范思哲的时装之美和由此带来的恬静与愉悦。我极其固执地相信,作为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他负有对中国的基本国策投入更多关注的责任,这关系到亿万民生和千秋万代的福祉。

## 《茶座填字》答案

横向:

1. 政经;2. 资本市场;3. 黄金;4. 新人口论;5. 经济计量学;6. 长周期;7. 创新;8. 权贵资本主义;9. 法权;10. 价值;11. 委托人;12. 红利;13. 贸易战。

纵向:

一、新增长论;二、计委;三、经济人;四、托宾;五、期权;六、法人;七、资本论;八、出资人(或投资人);九、市场经济;十、价格战;十一、业主;十二、统计学;十三、义利;十四、分红;十五、金融学;十六、新经济;十七、利率。





## 『暴利』的产业与决策的科学化

● 辛向阳 \*

如果问:什么产业最“暴利”?你会说:移动通信、有限电视收费、石油化工等。你可能想都想不到有一个行业会产生巨大的利益,这就是不为人知晓的政府咨询产业。

说它“暴利”,这得从兰德公司说起。1950年,美国发动侵朝战争之前,曾委托兰德公司进行研究,研究中国入朝作战的可能性。兰德公司投入人力、物力进行研究,研究的结果是七个字:中国将出兵朝鲜。兰德公司准备以5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美国国防部。国防部认为中国不会冒险跨过鸭绿江,而且认为兰德公司的价格太高,就拒买兰德公司的咨询报告。不久,中国人民志愿军就跨过了鸭绿江大桥。兰德公司的预见成为了现实。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国防部还是以300万元的价格买断了该报告。这是多么值钱的行业!

决策的科学化是政府追求的一个目标,如何使决策科学化?以温家宝为总理的新一届政府致力于科学民主决策,新修订的《国务院工作规则》中突出了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行政和加强民主监督问题,明确规定了国务院在做重大决策之前,要直接听取民主党派、群众团体、专家学者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实际上,从2003年3月新政府组建到7月份短短的100天内,温家宝总理亲自主持的专家学者座谈会就达6次之多。例如6月17日温家宝主持召开了“加强公共卫生建设,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专家座谈会,听取了胡鞍钢、薛澜、应松年等7位专家的发言。(见《瞭望》2003年第25期,第6页)6月27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听取了樊纲、贾康、陈准等5人的发言。(见2003年7月9日《经济参考报》)这些民主化的座谈促进

\* 作者系首都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了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也就是说政府已经找到了科学决策的好办法。很多地方政府也在不断举行类似的专家咨询会。例如 2003 年 8 月深圳市政府制订了《深圳市政府投资项目咨询专家管理办法》，规定政府投资项目必须听取专家的咨询意见与建议。

我认为，决策要经过专家学者的论证咨询，这只是解决决策科学化的一个开始。决策的真正科学化有赖于形成一个成熟的政府咨询产业，因此培养政府咨询产业是今后的一个重要工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提高政府的决策科学性，就要“加强政府咨询研究部门力量，重大政策决策要经过咨询研究部门的论证。20 世纪 80 年代上半期政府在这方面做得较好，每有重大决策，都先由社会科学院、国家体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等政府咨询机构进行专题研究，各自独立提出可选方案，并组织内部讨论会加以讨论，再由政府领导拍板决策。有的地方政府（如武汉）还提出过‘不经咨询论证不决策’的原则。但在 80 年代中期以后，政府似乎越来越倾向于靠下属执行机构来制定政策法规和实施方案，而不征求其他部门的意见。这样，就容易出现向执行部门的利益或它们的便利倾斜的片面性，这种情况也是需要改变的”。（见《社会经济问题研究》2003 年第 6 期第 2 页）

一个成熟的政府咨询产业可以为政府带来真正成熟可靠的决策建议。美国的政府咨询产业的发展值得关注。早在 1980 年，美国就有 785 家专门从事政府咨询研究的基金会。1980 年资产超过 2000 万美元的基金会就有 50 家。到 2003 年政府咨询产业更是迅速发展。仅在华盛顿就有 1500 家政府咨询机构，它们每一家的资产都不少于 500 万美元，总资产在 100 亿美元以上。

有了这样一个咨询产业的存在，政府的决策就有三个保证：决策的范围是广泛的，一个重大决策可以得到众多决策咨询机构的论证；决策建议是独立的，每一个决策研究机构由于有自己独立的经济来源，因此在提出决策建议时不容易被他人所左右，而且为了赢得自己的咨询信誉，咨询机构会下大力气对决策方案进行分析；由于有众多的咨询机构，它们之间会展开竞争，从而使政府决策的效率得到保证。相比之





下,我们的政府咨询主要还是“个体咨询”。“个体咨询”的最大弱点就是其偏好明显,在进行咨询时片面强化自己所熟悉的知识,很容易对决策产生误导。再一个就是“个体咨询”不承担什么责任,我说错了,没有板子会打到我的身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很多决策经过了专家的咨询仍然会大量出现失误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缺少产业化这一平台,专家建议仍采取个体、派别的方式,影响和效果并不理想,也会导致一种智慧资源的浪费。这就像生产厂商一样,与其滔滔不绝夸耀自己的技术、性能如何先进完美,不如把产品造出来更有说服力。技术可以创造产品,思想也可以成就决策。

决策咨询产业化的最大好处之一,是使改革方案的提供者与改革利益的相关者分离,为决策科学性的实现提供最基本的前提。这种独立性,对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加快行政体制改革具有现实意义。

决策产业的发展使很多政府咨询研究机构脱颖而出,它们不仅为自己赢得了丰厚的利润,而且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美国的政府咨询机构在 2001 年达到 1 万家左右,从业人员达到 30 万~50 万人左右。这里举一个例子,就是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该研究所是一个叫布朗的人于 1974 年创立的。布朗曾在美国农业部任研究员和部长顾问,后来离开农业部,以个人的名义创办了世界观察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拥有固定研究人员 30 人,每年从各种基金会和国际组织获得的研究经费为 400 万美元,此外,每年销售研究所发表的十几种“醒世报告”还能赚 400 万美元。由于布朗对于国际环境运动的贡献,他曾获得 1989 年联合国环境奖和 1995 年“蓝星球奖”。1995 年“蓝星球奖”的奖金为 50 万美元。由于有充足的资金,该研究所提出了大量有价值的报告,包括那篇曾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的报告:《谁来养活中国》(1994 年)。

正是由于政府咨询机构经济上的独立性,它们能够独立地从事研究,提出自己的见解,为政府出谋划策,使政府决策省心、省力、高效。看一看美国制造业的崛起与政府咨询机构的关系,就能生动地说明这一点。

二战以后美国制造业雄居全球,处于领先地位。但到 1965 年后,日本在美国的扶持下开始崛起。标志之一就是贸易平衡的逆转。1965 年美国对日本的贸易开始从顺差变成逆差,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 80 年

